



● 主编 张宝明 王中江

回眸《新青年》

哲学思潮卷

《新青年》：一代萃集伟言谏论的文化
名刊，一个启迪时代智慧的思想源泉。
——世纪性的大预言在这里诞生；
——民主与科学之火在这里点燃；
——人类的终极关怀在这里升腾……

河南文艺出版社



NEW

新文化元典丛书



0891802

● 主编 张宝明 王中江

回眸 《新青年》 哲学思潮卷



河南文艺出版社

新文化元典丛书

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

主 编 张宝明 王中江

责任编辑 王国钦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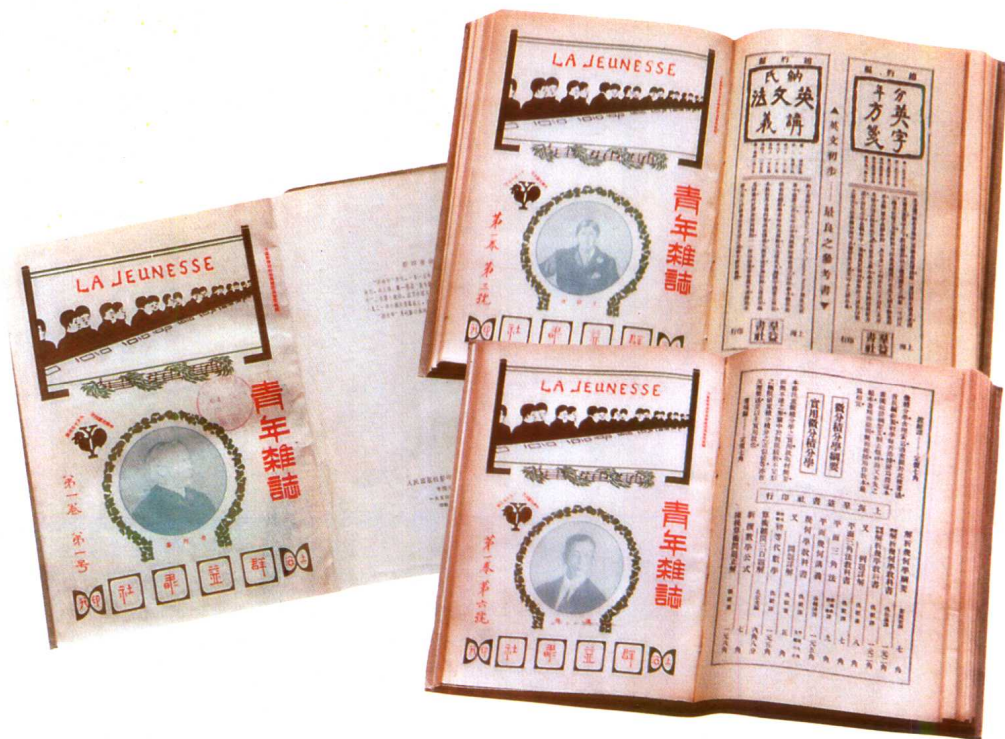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37

字数 757000 印数 1—5000

ISBN7-80623-081-5/I·57

定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第一卷封面



▲《新青年》封面



◀《新青年》1936年重印之合订本



▲《新青年》内文版面

《回眸〈新青年〉》编选出版说明

一、为展现中国新文化元典风采，为昭示中国新世纪辉煌未来，为加强当代新青年之历史使命感，本社特对《新青年》进行首次系统、全面的整理编选，并在此基础上出版套书《回眸〈新青年〉》。

二、《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2年7月休刊，先后共出版九卷54号。凡原载于《新青年》之重要文章或文学作品，皆在本书编选之列。所有入选文章或作品，一律按“语言文学”、“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想”3卷进行类编。各卷、各部分，均按《新青年》原刊之时间及篇次顺序排列，原刊之卷、号则在篇末注明。

三、以尊重元典原貌为原则，《新青年》原刊文章或作品之内容，本次编选一律不作改动。其中如“的(底、地、得)”、“他(她、它)”、“原(源、猿)”、“辨(辩)”、“着(著)”、“分(份)”等单词之同用互用，如“智(知)识”、“狠(很)好”、“公(共)同”、“提唱(倡)”、“出板(版)”、“箸(著)作”、“止(只)有”、“只(这)个”、“那(哪)里”、“同人(仁)”等语词之同音通用，如“马格(克)斯(思)”、“昂(恩)格思(斯)”、“莫巴(泊)三(桑)”、“哥(高)尔基”、“布尔札(什)维克”等外文之译音混用，如“阶段(阶级)”、“批评(批判)”、“摇动(动摇)”、“侈奢(奢侈)”等语词之同义杂用或倒用，皆当时之特殊语言现象；又如“适”、“独秀”、“唐俟”、“T. S.”、“二十八画生”等作者当时惯用之署名，如数码、纪年、句中注、篇中注及文前、文后附记等当时一般通行之用法，因无妨今日之阅读与理解，或对原文具有一定之参阅意义，本次编选亦均未作改动……故此，请读者于阅读时自作斟酌。

四、因《新青年》原刊乃繁体竖排，故作者于行文时，或有“述之如

左”、“如右所述”等用语。为葆其原貌，本次编选一律未作改动。

五、以方便当代读者为方针，本次出版特将《新青年》原刊之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新青年》原刊之排印问题较多。因此，如原文中确系显见之错讹、衍文、缺漏或模糊不清者，确系显见之标点、符号及句读不规范者，本次编选分别由主编或责编予以勘误、订正、校补、标点。个别存疑却又无从稽考或有特殊意义、特殊用法者，则一律仍如原状。恕不一一说明。

六、《新青年》原刊外文之使用略欠规范，而且在印刷中又误排较多，本次编选由主编分别予以校正。同时，包括一些典籍、专业方面的同类问题；责编又与有关专家分别作了进一步校订！

七、为不致与《新青年》原编者发生意义上的混淆，本书特在有关说明文字中以“编选者”自署示以区别。原系“随感录”、“通信”、“讲演”之类文章无标题者，概由编选者另拟适当标题并加以说明。由于篇幅所限，个别较长之文章或不甚重要之内容，本次则由编选者作了“节选”处理。

八、本次出版，主要以1954年人民出版社影印之《新青年》为底本进行编选，校改时参考了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求益书社重印之《新青年》暨某些作者的个人文集。各卷卷尾，均以由主编就该卷内容所撰之导读专论与由责编校勘之《〈新青年〉总目录》等作为附录，以满足各类读者之不同需求。

九、本书开本参照了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求益书社重印之《新青年》形式，用于书前插页之图片及用于内文补白之尾花、格言、谚语等，主要选自《新青年》原刊，恕不一一注明。

十、由于水平及时间所限，也由于《新青年》卷帙浩繁，本书中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各界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一

张岱年

学术和思想文化总是在开放和自由争鸣的宽松气氛中跃进和繁荣,在整齐划一、一个调子的沉闷状态下萧条和枯萎。通观起来,这种情形不仅无分于古今,也无分于中外。

幸运的是,在中华民族从古到今 5000 年的历史中,虽然自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是也出现过两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便是近现代时期。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人们的生活可能不稳定,却极其有利于思想和学术的茁壮成长。时代灵感和思潮,往往都在这种时期涌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盛况,是中国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到了近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的先知先觉者都在寻求“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帝制”,“五四”运动掀起了文化变革的高潮。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尤其是现代,充满了波澜壮阔的变动,在文化学术上也呈现出思想活泼、争论繁多的兴盛局面。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 2 次百家争鸣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一方面是实证科学的输入,自然科学受到社会公众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哲学、政治、经济等种种思想和观念的输入。就哲学而言,西方的古希腊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大量开始涌进;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于是使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受到一些人的赞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始传入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关于西方哲学水平较高的译著并不多,但对中国思想界所引起的震撼却异乎寻常。第二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清代末年,守旧的顽固派固守中学;维新运动失败后,又出现复古逆流,出现了一个孔教运动,要把孔子作为教主,确立起“国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了对“尊孔读经”的批判,多方位地检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弊病,使“儒学独尊”成为历史的过去。

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无法不把它同《新青年》杂志联系起来，正如谈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能不把它同黄河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易白沙、高一涵、蔡元培等一批大家的名字分不开的话，那么这批大家活动的舞台就是《新青年》。正是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他们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从旧道德到新道德、从旧学到科学、从君主专制到自由民主、从旧文学和文言文到新文学和白话文等等，他们在这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转型壮举。对于《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贡献，蔡元培和胡适在30年代分别曾有这样的评价：“《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这是对《新青年》杂志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温故而知新。在世纪相交之际，重读《新青年》杂志，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新青年》杂志的初版和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求益书社的重印版，至今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成为图书馆的珍藏，已不易看到了。特别是初版，虽然50年代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影印版，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仍然阅读不便。张宝明同志和王中江同志从《新青年》中选出重要文章重新编排，题为《回眸〈新青年〉》，这是《新青年》杂志的第1个编选本。它对于研究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是有重要意义的。编者邀序于余，于是略述《新青年》的历史功绩和重编价值，向读者推荐。

1997年4月 于北京大学

序 二

韦政通

(一)

在历史层次上，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它的历史意义及其深远的影响，于中国现代史上，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的刊物，可与相比的。

第一，它代表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过后约7个月，孙中山在写给海外同志的信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文中所谓“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指的正是陈独秀、胡适等人。而引起“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当然就是指《新青年》的言论了。孙中山虽不是最早对“五四”运动做评价的人，但把《新青年》的言论和“五四”运动视之为“新文化运动”的，盖始于孙氏。从此以后，“五四”运动（广义的）与“新文化运动”，在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几为同义。尽管“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相当复杂，推动这个运动的也不只是《新青年》一家，但“推原其始”，仍以《新青年》最具代表性。作为历史见证者，孙中山的看法是很可信的。

第二，它发动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乃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始时虽遭到旧派文人与学衡派的反对，但那毕竟是一个群众运动勃起的时代。白话文正因时代的需要，经由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很快便传遍全国各大都市。仅仅在1919这一年中，就出现了400种以上的白话报。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由“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几个意识形态之间，始终争议不断。唯有文学革命中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少有异议的。这个运动酝酿于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第1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态度很和缓，他只希望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一起来讨论。可是，这篇文章一到陈独秀手上，立即触动了文学革命的灵感，于是“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随即发表了火力强大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在美国看

到此文，写信给陈：“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的回答却是：“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从这种地方可看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胡适比较理性，陈独秀则充盈着浪漫的激情。“五四”时代的思潮，毕竟是既浪漫又革命的。

第三，它促使知识青年觉醒。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出6期后暂停，翌年9月1日复刊，易名《新青年》）。发刊词说明办杂志的宗旨是：“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在前6期中，除第4期外，共发表有关青年的文章12篇，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有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还介绍了德国、英国、美国的青少年团。初期的《新青年》，似如鲁迅所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迁到北京后，因北大在高等学府中地位崇高，不少教师加入笔阵。从1917年开始，文学革命、激烈的抨孔言论、女权问题、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易卜生主义，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极具争论性的问题，陆续登场，使《新青年》原先仅约千份的销售量，暴增到16000。直接受其影响的，当然是北大的学生。

1918年11月，以胡适为顾问，李大钊提供场地，包括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在内的北大学生，成立了“新潮社”，并于次年元月创刊《新潮》杂志。根据傅斯年的回忆：“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发起者共21人）他们觉悟了什么？可从创办《新潮》的旨趣看出来：（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且打出“伦理革命”的口号。可见《新潮》完全是在《新青年》的鼓舞下诞生的。

于《新潮》同时、稍前创刊于北京的杂志，还有王统照、徐彦之、郑振铎等的新文艺刊物《曙光》，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的《新社会》，他们也都是受《新青年》启发的一群年轻人。远在湖南的毛泽东，1918年初刚由省立第一师范毕业，4月便和他的朋友蔡和森等，于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爱读《新青年》，也钦佩陈独秀和胡适。

第四，它激发新儒家的兴趣。

在广义上，当代新儒家是从梁漱溟开始的。梁氏于1917年12月到北大任教，正值《新青年》抨孔言论大行之时。他就在这不协调的环境和气氛中，开设“孔子研究”的课程，宣扬孔子之道。如果说《新青年》是在造孔子的反，那末梁漱溟是在默默地造反孔之反。他不像学衡派，与抨孔者正面交锋。在呕心沥血的困思中，他超越了“新”、“旧”、“中”、“西”的对垒，把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三大文明——中、西、印的高层次上加以比较。在比较中，赋予孔学在世界文化中的意义和地位。

梁漱溟在北大时，新派教师（也是《新青年》的主将）除陈独秀、胡适之外，还有李大钊、顾孟余、陶孟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等，旧派教师有辜鸿

铭、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马叙伦等，皆一时之选。因蔡元培的聚拢包容，群集于北大，真可谓风云际会。梁以仅读过中学的年轻教师的身份，处于高人很多的环境之中，心理上所受压力之沉重，可想而知。但梁漱溟毕竟是一位极富潜力的人物，他当时已充分自觉到，北大确是培养自己的好环境，在此气氛中正可从此收拾精神，向人生的新目标奋进。这一时期，他既非新派，亦非旧派，他的不凡足能把“新”、“旧”、“中”、“西”之争所有的刺激，在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中，一一转化为生命能量的增进，把原先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在艰苦不懈的努力中，转变为思想的动力，终于写出一举成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儒家在当代复兴的先声。

第五，它是马克思思想极具影响的传播者。

在19世纪末的中国，马克思的思想，便有一些零星的介绍。20世纪初出版了几部社会主义的著作，皆由日文翻译。国人较有系统介绍马克思的思想，始于孙中山的信徒朱执信所撰《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长文，发表于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第2号，那是1906年。一直到民国初年，这方面的思想，在国内的流传仍非常有限。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影响，是从《新青年》开始的。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四卷一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轮流主编（有的书上说鲁迅也是主编之一，不确）。1919年5月那一期，轮到李大钊，他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内容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下，下篇载于次刊）；顾兆熊（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黄文山）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由于《新青年》本是一个自由论坛，因此专号的文章并未一面倒地颂扬马克思，顾兆熊的文章便对唯物史观提出很有见地的批判。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反映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稍后便出现李达转介《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的文章。从此以后，宣扬马列主义的文章渐多，到1921年，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策划专号，除十月革命影响之外，因1918年适值马克思百年冥诞，加上出刊时正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极佳时机。

（二）

以上五点，对《新青年》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了解，虽非全面，但已足够说明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确已使文化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纷争和大对决的开始。至今虽已经历80年的风云变幻，但这些意识形态仍在演变之中，纷争仍未停息。因此在思想评价上，往往不免各取所需，各是其是，各非其

非，很难做出公平的处理。

跳出各自不同立场的偏见，就总体观察，曾有人把《新青年》的文化思想运动，比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有人将它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已指出二者之间的截然不同。14年前，我在《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一文中说过：“中国启蒙运动开始的时期，正是以西方浪漫主义为时代背景。当时中国要求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些元素，事实上却受到19世纪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西方启蒙运动，不只是反偶像和怀疑精神，它在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方面的创造，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与成就，不是我们“五四”时代的文化思想运动所能比拟的。不过，它呈现的多样性和多层面，也的确有些类似。

我在26年前所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的长文中，曾就“儒家传统与民主科学”、“家族主义与个人”、“礼教与法治”、“定于一尊与多元主义”等4方面，对《新青年》的反儒家言论加以检讨，并提出一些批评。我说：“《新青年》的作者群，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最严重的是：他们提倡民主、科学，可是在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上，却具有反民主、反科学的明显倾向。”并指出他们对中西文化讨论态度之独断，主要在表现强而有力的情绪，以增进战斗精神，是历史上道统论者对付异端常有的态度。不但引起无谓争端，甚至产生灾害。

当年的批评，至今虽仍觉得在道理上是站得住的。但当我对“五四”前后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不能不说我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与苦心，“同其情”的程度是不够的。在书斋中工作，讲求理性已不容易，何况在国势陵夷、整个民族遭受巨大屈辱之时？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理性所能起的作用是很少的，否则人类的历史为何总是充满着灾难！美国撰写《改变历史的书》的唐斯博士发现，除开自然科学的书之外，大部分书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即那些作者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具有狂想的人。他们为了直接向千万人倾诉，书中所表达思想和意见，往往含有高度的感情成分。唐斯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新青年》作者群的言论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很有帮助的。

（三）

今日重编重印《新青年》，有人会问——特别是对这段历史已经陌生的知识青年会问：它对今日中国和未来中国，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有何启示？

第一，《新青年》时代“新”、“旧”、“中”、“西”之争，到今天大抵已过去，很少有人仍会把“传统”与“现代化”视为不能相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合的工作，虽然还有长远路要走，但一直在进步之中。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优势文化之前，中国学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已建立起自信，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各大传统展开实

质性的对话。这样努力的方向与成果，也正是《新青年》作者群所乐见的。过去我们谈论“五四”时代的言论，不免过分关注其中的全盘西化与反传统。其实《新青年》到中期，他们对自己的言论已进行反省。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七卷一开始（1919年12月），便发表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本志宣言》，主张“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和“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不再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而只是“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不再是全然的独断，而是“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虽然我们不敢说后来的努力，与《新青年》当年的这个宣言有何直接的关联，但不能不相信，合理的精神总是相通的。当然，《新青年》时代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今日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情势，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新文化。文化的重建，比发展经济要困难得多。如何使“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以及“创造的转化”不流于口号，如何在人类文明的竞赛中，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有赖于我们和下一代再下一代持续不懈的耕耘。

第二，《新青年》宣言，还有一重要的涵义，即它代表一种有国际气息的理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思想。这一点周策纵早已看出。萧公权于1947年8月，有《20世纪的历史任务》一文，发表在《世纪评论》上，就曾指出自由主义为西方18世纪的特殊贡献，社会主义为西方19世纪的特殊贡献。因此他揣想，20世纪的可能贡献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主义或政治运动，而是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调和二者的特殊贡献，使之成为一个“集成合美为人类造福的生活体系”。大家都知道，《新青年》前后最强烈凸显的两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惜在“五四”时代以后，这两种意识形态，不但对立，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这当然与这两大思潮在20世纪把人类分为两大阵营的世界情势是分不开的。不过在两大阵营的对垒时代，西方有些国家，已在吸取社会主义之长，在从事改革；最近若干年，有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已形成采取自由主义某些措施的趋势。这种趋势到21世纪，势必更加明显。《新青年》在现代中国，的确制造了许多思想上的纷争，但在这方面《新青年》的作者们还是有远见的。

第三，《新青年》的作者们，不论他们的态度如何独断，不论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也不论他们在后世的评价如何？我觉得他们多半是敢爱、敢恨、有勇气、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可能产生理想主义者，而危机时代产生的机率较大（不过危机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理想主义的兴起，往往有大众注目的问题，有值得牺牲、奉献的目标。世上能凭个人力量创造时势的绝无仅有，杰出的理想主义者，多半是能够掌握时代的脉动，乘势而起。

中国已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来。社会富裕、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但在一条鞭地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很多。不要说一般大众，即使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也已快被经济大潮所淹没。大家的生活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重现实，不重理想。就当前迫切要求的社会改革、文化

更新这两大目标而言，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

1997年3月7日 于台北碧湖之滨

序 三

陈平原

描述现代中国的思潮迭兴与学派崛起，无法绕开其时传媒之提供阵地与推波助澜。即便是独立不羁的文人学者，也无不以某种方式与报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要说口耳相传的旗亭题诗、酒席唱和，已无法满足现代人“广而告之”的欲望，即便追求传世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已经显得相当遥远。所谓“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①，报刊文章成了真正的“时代宠儿”。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发表，而后方才结集出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几乎所有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因此，不妨将某些曾“独领风骚”的报刊，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性文献来阅读——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新青年》。

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或者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的著作，固然是绝好的材料；但如果希望窥测这个运动的不同侧面，理解其丰富与复杂，把握其节奏与动感，阅读《新青年》很可能是最佳方案。比起个人著述来，“众声喧哗”的报刊，更像是某一焦点时刻的群众集会：有大致的趋向，却说不上“步调一致”。这或许正是晚清以降的报刊，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传播文明、开通民智的同时，没有走向“一言堂”并仍能保持“必要的张力”之奥秘所在。此种姿态，正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怀疑精神、开放胸襟以及多元的文化选择。比起众多显赫一时的口号或著述，作为中国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更能体现“五四”那代人的探索，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与诠释。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作者除原有的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外，更出现了日后对新文化运动贡献颇多的李大钊、胡适、吴稚晖、杨昌济、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吴虞等，杂志面貌日渐清晰起来。《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

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仁杂志。故谈论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一般只限于前九卷。

在正式出版的九卷54号《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3个时期，分别以主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仁的趣味与追求。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青年杂志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以上3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²⁾，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变化最大的是文科。大批学有所长并致力于文化更新的志士，被延聘入校任教，对于整顿校政和学风起了关键作用。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李石曾、章士钊、黄节、胡适、吴梅、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何炳松、王星拱、程演生、刘叔雅等，都是在蔡氏主持校政后进入北大的。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员中不少是（或即将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蔡氏的以下自述，常被史家引证，故广为人知：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³⁾

可蔡氏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一碗水端平”，进校后的一系列举措，明显地倾向于新派。除延聘具有新思想的教员（主要是文科）外，更包括组织学会、创办